

跟隨權力結構起舞的傳媒

李金銓

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媒介；而有怎樣的媒介，也就會有怎樣的社會。沒有一個傳播媒介是完全封閉自足的系統，它們都是特殊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的產物，自然也反映了這些獨特傳統的風格與環境的限制。美國社會與媒介的主流思潮均以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為基底，即使下面再粗分為自由派(liberal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也不過是程度之差，而非本質之別。像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似可歸類為追求自由主義理想「徹底實現」的激進派，這種人不論在美國或在西方各國都是空谷足音，寥寥無幾的，而他們論政攻擊的焦點往往是有血緣之親的自由派，對於互相視為異端的保守派反而懶得理睬。

美國的民主制度以資本主義為本體，便是建立在這個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面。大家在討論新聞自由時，總無可避免地要拿美國媒介作為比較的原形或基準，於是它就集全世界羨慕、鄙夷和咒罵於一身了。美國媒介當然沒有不可批評的道理，但任何批評務須嚴肅地觸及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共產國家長期以來的官方宣傳都企圖從根本否定自由主義，它們認為美國媒介只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資產階級用媒介來壓迫無產階級，而世界上也沒有「超階級」的新聞自由，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就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類似的指控在某些比較嚴肅的學者中也常聽見，其是非未必有定論，但其論證是否周延畢竟可以斟酌；而官方的教條率皆缺乏深刻的分析，特別是在參照「黨有、黨治、黨享」的媒介體制之後，更叫人難以接受。

自由主義豈是不堪一擊的？歷史上，自由主義曾經把人類從專制皇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三年前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出版一本頗受爭議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①，他說在本世紀內自由主義先打敗法西斯主義，然後又逼退現行共產主義制度，使之紛紛瓦解，一一崩潰，因此他信心十足地宣稱人類終於在自由主義找到最後的答案。其實，福山的許多基本假設恐怕站不住腳，共產國家崩潰未必就會平穩過渡到自由民主制度，何況人類社會會否再從自由主義逆轉殊難預料。福山的話不能盡信，但有一點殆可斷言，那就是自由

大家在討論新聞自由時，總無可避免地要拿美國媒介作為比較的原形或基準，於是它就集全世界羨慕、鄙夷和咒罵於一身了。任何批評務須嚴肅地觸及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但中國官方的教條皆缺乏深刻的分析，特別是在參照「黨有、黨治、黨享」的媒介體制之後，更叫人難以接受。

主義發展至今遭遇了種種難題，卻仍堅挺不拔，絕非一般庸俗的教條者憑空用壯膽式的嘴巴所罵得倒的。今天美國國內和第三世界弱勢團體進行抗爭時(包括反美運動)所揭舉的旗幟，主要還是自由主義的一些理想。就近取喻，橫跨中國近代史上的將近百年之中，從「五四運動」(1919)到「六四運動」(1989)，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和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都衝破時地阻隔，而響徹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自由報業的挑戰

在學術界對於各國新聞模式的比較研究中，以《報業的四種理論》發其端，這本書的作者席伯特(Fred Siebert)、皮特遜(Theodore Peterson)和宣偉伯(Wilbur Schramm)都是50年代美國新聞學界開風氣的人物，他們所提出的四種規範性報業理論自然代表了當時西方的主流觀點^②。他們首先批評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模式的報業，這個模式原來涵蓋了傳統式的家長制與皇權制，但在全球冷戰格局下實亦可指涉在美國扶植下的右派軍事政權。作者們接着鞭撻蘇聯模式，其實蘇聯模式更可以引申概括多數共產國家的全權主義(totalitarian)模式，它們的特徵就是用黨的紀律使權力史無前例地集中化。另外兩個則是自由主義模式和所謂的「社會責任」模式。「社會責任」模式嚴格地說不能獨樹一幟，頂多是自由主義模式的旁支，代表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肯定市場的運作，但也抨擊市場運作過程中所造成的偏差。

換言之，過分的商業掛帥驅使媒介競逐暴利，不惜使用聳人聽聞的方式進行人身攻擊，報導偏離事實，誹謗橫行，違法亂紀。尤其在本世紀30年代美國報閥普立茲(Joseph Pulitzer)和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惡性競爭，無所不用其極，製造了醜陋的「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譁眾取寵，足為殷鑒。在這個背景下，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R. Hutchins)主持的「報業自由委員會」於1947年發表了一份報告書，重申自由的基本原則，但呼籲新聞界在自由的基礎上擔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務使報紙的報導真實全面，成為公眾評論交流的議壇，並能如實地代表社會的組合群，以及澄清社會的原則與價值。他們主張靠媒介的倫理自制，而不是政府的外力干預，來解決這些弊端。

也有論者更進一步批評媒介無法充分體現、甚至背離傑佛遜式的民主理念。傑佛遜原以新英格蘭的小規模城鎮為藍圖，人際接觸頻繁、密切而融洽，彼此互通聲氣，而媒介提供真實多元的資訊給市民，使他們在平等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問題是一旦美國發展為大陸型高度都市化和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傑佛遜的浪漫情懷就難以落實。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使包括媒介在內的生產工具日益集中，里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寫《民意》時對這個趨勢即已慨乎言之^③。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跨國公司的飛騰躍進，大舉獨佔國內國外的各種資源，媒介所有權的集中愈演愈烈，不但美國各城市只能獨沽一報，貝戈狄肯(Ben Bagdikian)的研究更指出，全國半數以上的報紙均被29家大公司所壟斷^④。其他媒介領域(廣播電視和傳播新科技)的壟斷則比報

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使包括媒介在內的生產工具日益集中，貝戈狄肯的研究指出，美國半數以上的報紙被29家大公司所壟斷，其他媒介領域(廣播電視和傳播新科技)的壟斷則比報紙更有過之無不及。

紙更有過之無不及。美國如此，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亦然。更麻煩的是這個問題至今還是解決無門。

第三類的批評者是更激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站在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邊緣地位，一方面攻擊以蘇聯為首的僵化列寧主義使媒介淪為黨官僚組織的壓迫工具：一方面又批評資本主義媒介所有權高度集中於少數大財團之手，多元（尤其是激進改革）思想言論的表達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媒介非但不能成為解放的力量，甚至還鞏固了社會的異化與加深了人對人的剝削。他們承襲激進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企圖在兩極之間尋求理想的第三條道路，而他們所描繪的這條道路也往往取決於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不同詮釋。他們的言論激越，分析精彩，在各國學術界發展出多采的風貌，例如在德國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在法國馬克思主義又與結構學派合流，在英國則採擷歐陸各學派（特別是意大利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而發展出文化研究的顯學，然後再遠渡大西洋到美國生根。總的來說，這套學說對自由主義的衝擊和激盪非常深廣，但其影響力畢竟局限於知識界與學院牆內，對於牆外的實際政治卻時興強烈的無力感和疏離感。

喬姆斯基反對一切建制

我覺得若要找個最激進的學者兼知識份子，當非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教授莫屬。他是享譽三十年的語言學大師，也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媒介意理控制最雄辯、最尖銳的指控人。

儘管喬姆斯基自認為他的語言學理論一直是「少數的立場」，《大英百科全書》卻說：「今天語言學上的重大理論問題無不在他所界定的範圍內辯論。」另據《藝術人文引述索引》指出，在過去十二年中他在學術期刊被引述的次數最多，《紐約時報》甚至讚揚他「或是在世最重要的知識份子」。

據喬姆斯基自述，他從小就接受激進的思想，長大後立場愈加堅定。他言行合一，數十年如一日。60年代中期，他跳出來強烈反對美國的越戰政策，曾為此短期入獄，並名列尼克遜總統那張惡名昭彰的「敵人名單」。近二十年來，他更義無反顧地抨擊美國在中南美洲扶植軍事專制政權，又在中東偽善地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恐怖壓迫，因此他素為其猶太族裔人士所憎惡。有人說他是美國知識界的良心，但主流媒介和權力階層則避之唯恐不及，洵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喬姆斯基實在不拘一格，他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激進派，沿襲着傑佛遜式的民主理想，還帶有頗濃的民粹和啟蒙色彩，對所謂的精英或意見領袖的虛偽絲毫不假辭色；另一方面又表現出無政府主義傾向，他說：「不管建制 (establishment) 是甚麼，我都反。」^⑤此外，他在意識形態上與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互通款曲，對媒介的政治經濟分析也形似馬克思主義者的取徑，但他的整個學術淵源卻並非馬克思式的，至少在著作中不大使用馬克思的概念和詞彙。他固然反對美國的建制，也抨擊布爾什維克革命毀滅了社會主義。60年代在

喬姆斯基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激進派，沿襲着傑佛遜式的民主理想，還帶有頗濃的民粹和啟蒙色彩，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與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互通款曲，對媒介的政治經濟分析也形似馬克思主義者的取徑，但他的整個學術淵源卻並非馬克思式的。

反越戰的聲浪中，許多美國左派一廂情願地支持北越的胡志明，而喬姆斯基卻指出胡志明是個獨裁者，然而那也並不表示美國有權利侵略別的國家。

媒介只能在小範圍內發言

在他諸多媒介批判的著作中，《製造同意》和《必要的錯覺》兩本書可為代表^⑥。喬姆斯基把戰線拉得很廣，首當其衝者是自由派的言論堡壘，特別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及其內部自由色彩鮮明的專欄作家（例如Tom Wicker和Anthony Lewis），因為這些一言九鼎的自由派媒介雖然時常批評美國制度與政策，但畢竟只限於執行上的細節，卻全力維護整個基本政策的中心假設，因此喬姆斯基企圖擒首，從他們開始斷源截流。他說《紐約時報》根本就是「官報」(official press)，對既得利益只知小罵大捧，製造貌似社會上有不同意見的幻覺，其實「只表達狹隘的政府與大公司的意識形態(state-corporate ideology)之一支，而且是特別有用的一支，（因為它）隱含的信息是：到此為止，不能再進」^⑦。他說如果哪一天《紐約時報》開始評論他的書，第一個問題他要問的是：「我作錯了甚麼？」^⑧至於保守派對美國政策的載歌載舞，在喬姆斯基看來大概是不值一駁的，反而著墨殊少。

喬姆斯基說，正如專制制度需要靠暴力使人屈服，民主制度也需要透過宣傳為既有秩序製造統治的共識，把人民對體制的效忠自然而然地建立於無形之中。自由派認為媒介靠着在多元客觀的「自由意見市場」運作，一方面有自我矯正和調整的功能，一方面制衡既得權力結構的腐化。喬姆斯基完全否定這種說法，指斥自由派只不過是在製造幻覺罷了。他提出一個「宣傳模式」，宣稱美國不啻是個製造恐怖主義的超級強國，而媒介就是它一名得力的「宣傳員」。他說^⑨：

總之，主要的媒介——尤其是設定議題給別人跟的精英媒介——把有特殊地位的視聽大眾「賣」給其他大商家。如果它們所呈現的世界圖像反映買賣雙方和商品本身的觀點與利益，則是不足為奇的。媒介的所有權高度集中，而且愈來愈烈。此外，位居媒介經營或評論要津者，同屬特權精英，可以期望他們都抱持類似的看法、期望和態度，反映階級利益。進入這個系統的記者只能同化於這些意識形態的壓力，通常是把新聞價值內化，否則難有發展；講一套相信一套是不難的，誰無法同化則會被熟知的機制所淘汰。

他指出，美國媒介只能在政商利益所劃定的範圍內講話，凡逾界去挑戰基本體制的思想言論，不被淘汰出局者幾稀矣。但環顧全世界，只有美國憲法明禁政府立法箝制新聞自由，媒介在日常報導中復勇於揭發政府與大財團的濫權腐敗，例如「水門案」甚至逼一個霸道十足的總統下台，又該當何解？對這件事，他說，因為既得階層中發生「技術性的分裂」，若形諸媒介，表面上看起來很熱鬧，其實並未超出狹窄的允許範圍，更沒有危及核心的假設。「水門案」的

喬姆斯基說，正如專制制度需要靠暴力使人屈服，民主制度也需要透過宣傳為既有秩序製造統治的共識，把人民對體制的效忠自然而然地建立於無形之中。他諷刺說，蘇聯人民至少知道被專制文化所統治，美國人反而被徹底洗腦了，竟把細緻的思想控制當做自由呢。

矛頭只針對尼克遜總統本人，何曾直搗制度的核心：何況總統一去職，媒介更乘機忙着為體制運作如何順利大喝其彩。他說，既然既得階層有辦法把媒介的內容圍限在小圈圈內，就不怕(甚至可以鼓勵)它們報導表面紛爭，以塑造美國新聞自由蓬勃的假相，這對制度的穩定徒有利無弊。他諷刺說，蘇聯人民至少知道被專制文化所統治，美國人反而被徹底洗腦了，竟把細緻的思想控制當做自由呢。

雙重標準以美國利益為依歸

喬姆斯基作了一連串配對(paired)的對外報導個案研究，結論是只要抓到美國的敵對政權蹂躪人權，美國的媒介必大報特報，以證明美國制度的優越性；但碰到美國的附庸國貪污腐敗或侵犯人權，媒介則視而不見。因此，過去美國媒介先把尼加拉瓜扣頂「恐怖份子」的大帽，然後順水推舟，賴到國際共產黨的身上，這樣媒介就可以義正詞嚴地開罵。反觀美國在尼國鄰近所培植的薩爾瓦多，它的人權記錄其實比尼加拉瓜更惡劣，美國的媒介卻如一舟清水了無痕。媒介持雙重標準，何厚薩而薄尼，說穿了，就是端看美國的利益所在。又如美國長期撐着以色列的腰，任其欺壓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主流媒介當然是一面倒向以色列，想出種種理由替它粉刷罪行(例如《紐約時報》的猶太裔專欄作家羅森索(A. Rothenthal)，只要碰到有人對以色列稍有微詞，他就會暴跳起來)。喬姆斯基又指出，美國支持的印尼政府在東帝汶進行滅絕屠殺，慘絕人寰，居然逃脫了美國媒介的「法眼」，這樣明顯的「遺漏」豈是偶然？以此類推，天安門事件之所以舉世喧騰，原因很多，但這不也提供樣板，證明美式市場經濟勝利在望、共產主義走向破產邊緣嗎？

除了把媒介辯論框在小範圍以內，媒介還注意遣詞用字的技巧，以擴大意識形態的效果。喬姆斯基指出，媒介反正假定美國外交的動機總是高尚純潔的，世界各國又普遍「渴望美式民主」。美國不管是打越戰，或侵略巴拿馬，或制裁尼加拉瓜，都是在「抵抗國際共產黨的野心」，以及「捍衛民主與人權」的秩序。以此順推，美國有干預別國內政的正當性，當地人民則無權自衛，也無力抗拒。他說，美國在第三世界各地煽風點火，扶植若干以文人為名、以軍事獨裁統治為實的政權，以及製造種種暴行，都在「反共」、「民主與人權」和「世界和平」等等漂亮的名義下受到掩護。凡是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者，無論其政治立場和社會承諾多不同，多半還被冠以「親共」之名，必須清除而後快，好讓親美的「民主人士」取而代之。

喬姆斯基作了一連串配對的對外報導個案研究，結論是只要抓到美國的敵對政權蹂躪人權，美國的媒介必大報特報，以證明美國制度的優越性；但碰到美國的附庸國貪污腐敗或侵犯人權，媒介則視而不見。

長於批評，短於理論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的權威地位，我是完全沒有資格置喙的。他在媒介領域的成就，我想也許可以一分为二：作為一個社會批評家(social critic)，他所

關注的範圍廣泛，立場穩定一致，時間上縱貫三十年，全神投入，舉重若輕，無論敵友都不出其右。若以研究傳媒的學術來衡量，很多人無法接受他的分析和結論，姑不置論，但許多意識形態的知音者也會略嫌他的理論取徑粗疏空泛而武斷，往往不能曲盡其致。

說來有趣，喬姆斯基反對一切權威與建制，卻身不由己，變成了一顆閃亮的媒介明星。其實，他最自豪的是「宣傳模式」的準確性，他說他已寫了數千頁的東西，「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可說是證據確鑿，其預測能力尤有過之：誰能對這個結論提出嚴重挑戰，我沒聽說過。這個題目偶而能上主流(媒介)探討時，反駁的論據皆適足以證明它(宣傳模式)確實鮮活」^⑩。如果這個「宣傳模式」已成不移的定論，則萬變不離其宗，他那些一個接一個的個案研究——包括過去所寫的幾千頁記錄，正在寫的，和還沒寫的——豈不只是重複的註腳而已？這樣說來，他的一本本書主要的貢獻在文化評論，卻無助於理論的繼續發展。

必須指出：喬姆斯基的理論應該概括國內外，證據卻幾乎全來自媒介的對外報導。就在國內國外這個關鍵上，媒介的表現確是「內外有別」的。美國的兩大政黨同是中間選民的階級屬性，政綱重疊，故被喬姆斯基譏笑為「一黨兩派」：媒介在歷史上為了回應市場經濟的勃興，逐漸與政黨的立場脫鉤，崇尚所謂中立客觀的專業意理。(在西歐、香港和許多第三世界地區，傳統報業與政黨的關係也受到市場的衝擊而正日見式微。)事實上，新聞界如今已是簡單經驗主義的最後堡壘，因為媒介不能憑空談客觀公正，必須凍結特定的意識形態而後為之，以致媒介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而不自知。進一步說，美國媒介如何「內外有別」呢？在國內，媒介的場域即使排除激進意識，甚至壓抑少數的聲音，卻大致反映了主流社會內(即市場的中間地帶)各黨派、族群、階層和地區相對不同的利益。外交問題上卻連類似相對多元的聲音亦不多聞，美國的國家利益畢竟高於一切，結果兩黨常捐棄成見，媒介則成了外交政策的啦啦隊。在這個意義上，喬姆斯基的幾千頁著作不愧是社會批判的傑作；但以理論視之，則不免透露了若干限制和窘境，對媒介國內國外報導的異同尤乏反省。

喬姆斯基不甘在體制內作象牙塔的純學者，而是擔負社會正義、維護理想火苗的知識份子。正因為這個緣故，喬姆斯基似乎把他的「宣傳模式」幾乎提到「上網」的抽象層次。也許我們應該把論據適當地相對化，才能在各種境況和架構裏捕捉現實的複雜面和矛盾面。

「宣傳模式」太絕對化

質言之，至少在國內事務上，自由派有現實的理想面，也有偽善的現實面，他們強調社會的不完美只能靠溫和漸進的改革，故少作烏托邦式的幻想。激進派的眼睛則容不得一粒沙，由於任何類似絕對性的價值系統多少帶有宗教成分，他們道德批判的感染力特別強。喬姆斯基似乎把美國的自由制度太視為當然，然後又以理想的境界來對媒介進行批判，他在荒野上發出一片吶喊，其道德力量沛然。他不甘在體制內作象牙塔的純學者，而是擔負社會正義、維護理想火苗的知識份子。正因為這個緣故，喬姆斯基似乎把他的「宣傳模式」絕對化，幾乎提到「上網」的抽象層次，叫人很難不印證他的命題。媒介的確是服務既得利益的，主流媒介總是把激進思想邊際化，舉世皆然。正如「人生必有一

死」，這個命題縱然是天經地義的，但一經絕對化，死得「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都會變得無關緊要了，問題是那個上網式的命題對人生意義究竟有甚麼啟發？因此，也許我們應該把論據適當地相對化，才能在各種境況和架構裏捕捉現實的複雜面和矛盾面。

這樣，我們一方面肯定媒介是為既得利益服務的，但也承認兩者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的，媒介的控制方式與強弱隨制度而異：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新聞自由儘管距離理想甚遠，卻是真實的（不是虛偽的，也不是完美的），也是可觀的（不是微渺的，也不是無限的）。同時，媒介與權力中心的基本利益未必完全契合，權力中心對媒介一方面利用一方面防範，反之亦然，彼此的確存在着結構性的緊張，這也不能一概簡化為「技術性的分歧」。不這樣看，未免太藐視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嚴肅意義，也無從解釋世界各國為甚麼羨慕美國享有的新聞自由。再說美國媒介造成全球的文化霸權，引起第三世界普遍的不安與反抗，卻為被壓制的知識份子提供與外在世界溝通的櫥窗（這一點連喬姆斯基在本期的訪問中也坦承），可見美國媒介發揮既宰制又解放、既封閉又自由的效果，這個微妙的兩面辯證性格雖在此處無法詳論，卻有必要提出來強調。要之，如果說激進派把抽象層次提得太高，那麼自由派的謬誤則在於把它降得太低，以致誇張媒介對體制的制衡作用，而低估體制對媒介的制約功能。我們最好把問題放在抽象階梯，讓它上下自如地滑動，這樣觀點才可望融會貫通。

美國媒介造成全球的文化霸權，引起第三世界普遍的不安與反抗，卻為被壓制的知識份子提供與外在世界溝通的櫥窗，可見美國媒介發揮既宰制又解放、既封閉又自由的效果。如果說激進派把抽象層次提得太高，那麼自由派的謬誤則在於把它降得太低，以致誇張媒介對體制的制衡作用，而低估體制對媒介的制約功能。

政經分析未能曲盡其致

「宣傳模式」宣稱採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其實它的分析成分是「政」少「經」多，甚至是經濟壓倒政治。政治經濟學可以從經濟着眼看政治，也可以從政治着眼看經濟，最後總要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聯繫起來。由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深植於資本經濟的體系之中，其分析的角度多從經濟出發；但在後進資本主義社會，權力分配和經濟發展通常由威權的國家機器所主導，故多從政治分析着手。政經學派的優點在於從大處着眼，不糾纏末節，但缺點則是對過程的交代不清楚，有太多跳躍式的因果推論。為甚麼媒介是權力結構的宣傳員？喬姆斯基說，因為新聞必須歷經以下五個「過濾器」才能抵達大眾的身上：（一）媒介產權集中，利益掛帥；（二）廣告為媒介的主要財源；（三）媒介依賴政府、企業和它們資助的「專家」獲取新聞；（四）政商可用種種方法反擊媒介的負面報導；（五）反共成為美國的宗教和控制機制^①。

這個分析全無辯證的味道。他把這五個過濾器並列，可惜從未說明它們是否直線運作，或它們如何互動、聯繫或衝突，以及政商與媒介如何既合又離，相反相成。其實，資本主義的媒介受市場的制約，首先必須照顧它們本身的公信，否則也不可能成為有效的意理機制，為此它們可能有時要反映「反體制」的聲音，至少常叫在位者難堪，這不全是「技術性」的爭執而已。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反對把馬克思的「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視為兩個個別的「領域」，他強調霸權是控制與反控制的實踐過程，所以必須用動態

的具體分析來取代傳統靜態抽象的因果推論。他說：「鮮活的霸權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生產、保衛與修正。同時，它也不斷地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壓力所抗拒、限制、改變和挑戰。」^⑫可見媒介在製造霸權的過程當中不可能沒有出現抗拒、挫折、迂迴或轉彎，並不像喬姆斯基所描述的那樣理所當然或無往不利。

喬姆斯基對美國媒介的激烈批判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他經常穿插幾句話說，蘇聯不必管記者怎麼想，只要用暴力讓他們服從就行了，可是像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卻得把記者徹底洗腦，讓他們自然而然、心悅誠服地效忠體制。這個講法的精神頗神似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理論，晚近文化理論(例如威廉斯和侯爾(Stuart Hall))對它的發展創造尤具新意，可惜喬姆斯基只用這幾句話來過場，語焉不詳，從未認真分析個中精義。一個文化評論者有權把批評的對象鎖定在美國，讓別國人管他們的家務事吧；但一個傳媒學者的視野若孤立於美國，則結論就可能下得太絕，有流於粗疏而武斷之虞。如果用比較的格局看問題，美俄媒介截然不同，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也有異有同：再說，從自由社會看威權主義和全權主義，也許同為一丘之貉，但對於實際生活其中的人來說，兩者可能有天壤之別。如果我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十幾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那就是它把一個全權體制轉變為威權體制，採取政經分離的路徑，使媒介在非政治的領域得到初步喘息的機會。這一轉變雖似微不足道，但它的實際影響卻太大了，那是有目共睹的。

前面說過，政治經濟學勝在提供宏觀的圖像，對媒介日常運作的過程則不贊一詞。對此，媒介社會學在意理、專業和組織方面的近距離研究，業績豐碩，足以互補。舉其著者，甘斯(Herbert Gans)教授指出，美國新聞界的客觀信條其實深植於一組中心價值之上，包括文化自我中心、利他的民主、負責的資本主義、對小鎮田野的嚮往、個人主義和溫和漸進。美國媒介以此出發看世界，它們的成就與限制也盡在於斯。塔克曼(Gaye Tuchman)用現象學的濃筆栩栩描述媒介組織怎麼與社會上佔據中心位置的機構聲氣相通，利益結合，新聞編採的周期配合政府單位的作息和財團勢力的脈搏，以及新聞價值內化成為記者的工作規範。吉特林(Todd Gitlin)用霸權理論詮釋主流媒介用甚麼框架(frames)去醜化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哈林(Daniel Hallin)細緻地檢查媒介如何報導越戰，均遠比喬姆斯基的分析鞭辟近裏。在國際方面，文化批評界巨擘薩以德(Edward Said)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建構，其轉折多致更非一般政治經濟分析所能企及^⑬。

邊緣團體沉醉在若干非主流的通俗文化裏，明明是淹沒於文化消費的商品堆中，居然硬被說成顛覆體制。他們究竟顛覆了甚麼，解讀了甚麼，改變了甚麼支配性的權力關係？

媒介霸權與解讀

最後不免要觸及文化霸權的問題。傳播研究始終在媒介霸權與反霸權之間徘徊。喬姆斯基(還有很多政治經濟學派的人)主張：誰擁有媒介的產權，或誰能上媒介發言，誰就能夠製造意理霸權。許多實證論者長期以來卻強調，視聽大眾受到林林總總的心理和社會條件所中介，不會無條件當媒介子彈的靶子，

可惜此派的着眼點多半局限在體制以內。依照威廉斯的慧見，主流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必用盡方法，時時刻刻有選擇性地吸納或收編另類和敵對的意識形態^⑭。最近，有些批判性的文化學者受到後現代主義學派的影響，鼓吹受眾從各方面去解讀主流媒介的支配性信息。他們宣稱，文化背景的差異(如社會形成、階級、宗教和年齡)使媒介信息的解釋獲得「多元歧義」(polysemy)，大凡支配性的信息都可能被顛覆為另類的乃至敵對的意義來^⑮。以上這些觀點正逐漸滲透合流，儼然向霸權理論提出修正或發出攻擊。當然，強調受眾的自主性可以彌補傳統霸權理論中一些「全體性」(totalistic)的武斷意味，但就怕走火入魔，馴致以為世界上果真沒有支配，要不然也可化解它。有些浪漫的新左派在邊緣性的弱勢團體找到答案，一如當年的老左派在無產階級身上看到前途一樣。邊緣團體沉醉在若干非主流的通俗文化裏(如香港有些青少年的「無厘頭」音樂)，明明是淹沒於文化消費的商品堆中，居然硬被說成顛覆體制。歸根究柢，他們顛覆了甚麼，解讀了甚麼，改變了甚麼支配性的權力關係？說來可憐，有些前進的知識份子因為政治無能，只能意淫文化逃避，又美其名為解讀，這樣一廂情願，真是對激進政治莫大的褻瀆。

註釋

-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② 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 ③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 ④ Ben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1992).
- ⑤⑧ J. Horgan: "Profile: Free Radical — A Word or Two about Noam Chomsk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2, no. 5 (1990), pp. 40–44.
- ⑥ 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 ⑦⑨⑩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pp. 13; 8; 9.
- ⑪ Herman and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 1.
- ⑫⑭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2.
- ⑬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Daniel Hallin: *The "Uncensore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dward Said: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Pantheon, 1981).
- ⑮ 這方面的文獻愈來愈多，例如 John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

李金銓 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客座教授。